

一部反映汉字发展的巨著

——评《汉语大字典》

肖海波

《汉语大字典》出版发行了。它是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,经过广大编纂人员十年的艰苦努力而编纂成功的。《汉语大字典》是一部偏重提高的大型语文工具书。它继承了我国编纂字词的优良传统,集众家之长,古今兼收,源流并重,把科学性、实用性、知识性、系统性结合起来,建立了新的体系,历史地正确地反映了汉字形、音、义发展的内部规律。它的出版问世,标志着我国大型语文工具书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,必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。

我国历史悠久。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,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科学知识。汉语是中华民族表达意思、交流思想的工具。社会生产的发展、科学知识的增长促进了汉语的发展变化,而作为汉语书写符号的汉字也由甲、金、篆、隶形体而进到了现在的楷书形体的阶段。

汉字是象形表意文字。一字多形是汉字的第一个特点。一个方块汉字,不仅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有甲、金、篆、隶、楷等形体的不同,就是在一个历史的横断面上也有各种不同的形体。一字多音是汉字的第二个特点。古今读音不同,南北方音相异,这是早已存在的事实。一字多义是汉字的第三个特点。一个常用的汉字,往往有本义、引申义、假借义等多种含义。汉字的特点给积累和发展已获得的各种知识,交流和传承生产经验带来了条件,同时也带来了困难。在长期的使用汉字的过程中,人们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。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,更好地发挥汉字的作用,除了约定俗成之外,就必须有意识地对汉字进行整理。这种整理汉字的工作在我国历史上从未间断过。

整理汉字的工作始于周代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,早在周宣王时就有了《史籀篇》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·叙》中也指出:“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,与古文或异。”当时整理的对象是汉字的大篆形体。这可以说是对汉字进行的第一次整理。此后,出现了秦丞相李斯的《苍颉篇》、车府令赵高的《爰历篇》、太史令胡毋敬的《博学篇》。这是“秦始皇帝初兼天下”之后,为了“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”,对汉字进行的第二次整理。整理的办法是“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”。到了汉代,司马相如的《凡将篇》、史游的《急就篇》、李长的《元尚篇》、扬雄的《训纂篇》都对汉字进行过整理。这些都是第二次整理的余波,对汉字的统一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
这一时期,整理汉字的工作,大致呈现出这样的特点:一是从汉字字形上进行整理,编成四言、六言或七言的谐韵句子,以童蒙诵读的范本形式推广当时确认的正字;二是没有把汉字形、音、义各要素联系起来进行考察,而是孤立地整理汉字的某个方面,三是都属于断代性的整理,并没有从汉字发展的源流中去探讨规律。这些特点说明,整理汉字的工作这时

还处在启蒙阶段。

东汉的许慎大胆开拓,锐意创新。为了驳正今文学派对文字解释的牵强附会,“巧说邪辞”,他开展了对汉字小篆形体的整理。他吸取前人整理汉字的经验和成果,以经典明文为主要材料,从生动的语言实际中去研究汉字的形、音、义,形成了自己的体系。《说文解字》是许慎整理汉字的辉煌成果,是一部汉字发展史上不朽的宏篇巨著。许慎整理汉字的功绩超过了他的前辈。许慎的成功,不仅在于《说文解字》本身给我国字典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,而且还在于他打开了整理汉字“文字声音训诂”的大门,开辟了一条整理汉字的途径。那么,许慎在整理汉字上有些什么特点呢?

1. 有了“六书”理论。许慎总结和阐明了战国以来关于汉字形体的“六书”说法,为整理汉字找到了理论根据。“六书”之说,起源于战国,始见于《周礼·保氏》。汉代刘歆曾有过阐述。但是,用“六书”来系统地分析汉字结构,追溯造字源流,训释造字本义,应该说是从许慎开始的。在《说文解字》中,他明确地提出了“六书”的内容:“一曰指事。指事者,视而可识,察而可见,上下是也。二曰象形。象形者,画成其物,随体诂诂,日月是也。三曰形声。形声者,以事为名,取譬相成,江河是也。四曰会意。会意者,比类合谊,以见指撝,武信是也。五曰转注。转注者,建类一首,同意相受,考老是也。六曰假借。假借者,本无其字,依声托事,令长是也。”许慎以“六书”为指导,采用“分别部居,不相杂厕”、“据形系联”的方法,把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小篆,一千一百六十三个重文分别归属五百四十部,创立了部首分类法。这是字典史上的一个创造发明,是许慎整理汉字的一大贡献。

2. 把汉字的形、音、义看成一个整体。许慎已经看到了汉字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,因此在训释时能把它们融为一体,在每一条目下纳入了释义解形和音读。他通过分析字形来探求字的本义,并建立形声体系,用“读若”的方法注明音读。

3. 就总体来讲,《说文解字》对汉字的整理仍然属于断代性的。它以小篆为整理对象,只探求字的本义或基本义。但是,不少条目也涉及到了今文、古文或籀文。这就为历史地研究汉字的演变提供了端倪。

4. 引用典型例句佐证释义、解形或注音。许慎分析经典中的语句,归纳典型用法,选择适当的例证,使整理汉字的工作建立在语言实际的基础之上。

5. 注意吸取前人及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。《说文解字》在许多地方引用了著名的训诂学家,如刘歆、郑兴、杜林等人的研究成果。这对于提高整理汉字的学术价值有着重要作用。同时,许慎也不囿于某一种看法,而是择善而从,既引用贾逵的某些讲解,也引用王育的某些说法。

许慎整理汉字小篆形体,在我国研究汉字的历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。为后人整理汉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隶书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。对隶书的整理情况,我们现在已难于窥见全貌。但是,可以肯定,对隶书也曾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整理。晋代吕忱的《字林》、北魏江式的《古今文字》是这次整理的重要成果。可惜这两部著作早已亡佚。

汉字发展演变为楷书以来,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汉字自身演变规律的作用,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,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,因而整理汉字的频率很明显地加快了。从南朝梁顾野王的《玉篇》到清张玉书等人的《康熙字典》,以至于《中华大字典》,其间出现过一系列的字书,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楷书汉字进行过整理。这些整理工作都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,记录了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,其共同特点是:

1. 整理汉字的数量显著增加。楷书汉字的数量与日俱增,不断加多。因此,整理任务也越来越重。今本《玉篇》二万二千七百二十六字,《类篇》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字,《字汇》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字,《康熙字典》四万六千九百六十一字,《中华大字典》四万八千多字。这些都大大超过了《说文解字》,有的竟多达五倍。

2. 注重了对俗字的整理。汉字发展成为楷书之后,产生了不少所谓的“俗字”。这些字是楷书汉字的重要组成部分,有很强的生命力,因此,把“俗字”纳入整理的范围就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。《玉篇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楷书汉字字典,它就收列了当时流行的“俗字”。其它,如《龙龕手鑑》、《字汇》、《字汇补》、《正字通》等等,所收“俗字”就更多了。

3. 以楷书汉字为对象,不单独收列甲、金、篆、隶的汉字形体,不探讨汉字形体历史演变过程。以影响深远的《康熙字典》为例,在楷书汉字条目下虽然附列了古文,但是,这些所谓的“古文”都是已经楷化了的形体,而且没有进行解说。

4. 用一段注音法,以反切和直音标注音读。这比《说文解字》用形声偏旁和“读若”标音要先进得多。反切的运用使标注字音成为了一个整理汉字的独立部分。

5. 扩大了释义范围,注意了本义、引申义、假借义之间的关系。《玉篇》而下的楷书汉字字典,一般都建立了引申义和通假义项,常用义越来越受到重视。

6. 就总体来看,从《玉篇》到《中华大字典》,应该说仍然属于断代性的,它们没有历史地反映汉字形、音、义发展演变的全过程。在字形上,没有收列甲、金、篆、隶等典型形体,没有字形解说。在字音上,没有涉及上古字音,也没有把以往的古音与当时的今音加以区别,而只是笼统地用反切和直音标注。在释义上,没有对当时生动活泼的口语进行整理。

7. 确立了部首检字法。部首分类法是许慎的创造发明。但是,这种“分别部居,不相杂厕”的偏旁编字法,只是给汉字分类,按“六书”系统“据形系联”,并没有考虑到检索的方便,往往为查一字而终其全篇,实在叫人心烦。正象王力先生所说:“它是文字学原则的部首,而不是检字法原则的部首。”其后,顾野王曾想改进《说文解字》分部的办法,用“据义系联”代替“据形系联”,增删部首,立为五百四十二部,按三十卷编排,不仅字与字之间,而且卷与卷之间发生了联系。这比《说文解字》那种“部序和部内收字的次第都杂乱无章,并无严密的体例”前进了一步。但是,《玉篇》仍未突破《说文解字》的局限。

确立部首检字法的是明代梅膺祚的《字汇》。它突破了“六书”原则,舍弃“据形系联”,合併《说文解字》的五百四十部首为二百一十四部,并且“以字画之多寡循序列之”,每部中的字头也按笔画多少排列,并标明画数。这样就便于检索。当然,部首检字法也有不足之处,因此,不少字词书同时采用几种检字法。

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,整理汉字的工作在我国历史上已经形成优良传统,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宝贵的经验。整理汉字与编纂字典紧密相连,整理是基础,字典是结果。编纂字典的进步表明了整理水平的提高。

建国后,党和政府极其重视整理汉字的工作。我国建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等一系列有关机构,出版发行了许多专著和刊物,先后公布了《汉语拼音方案》、《简化汉字总表》、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》、《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》、《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》,同时,还编纂了多种类型的各具特色的字词典。特别是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,整理汉字的工作日新月异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、新版《辞源》、新版《辞海》等都已相继问世,为汉语的规范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但是,历史地全面地对汉字进行整理的是《汉语大字典》。《汉语大字典》继承了我国历史上整理汉字的优良传统,从汉字发展的全过程中反映汉字形、音、义发展的规律。在字形方

面，它对古今汉字进行整理，在字音方面，不仅标注现代读音，而且反映中古和上古字音的情况；在字义方面，反映字义发展演变的规律。《汉语大字典》对汉字的整理达到了新的高度，使我国整理汉字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二

《汉语大字典》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语字典，也是当今世界上收集汉字单字最多的一部字典。它以同文版《康熙字典》为收字底本，扩大收字范围，把历代字词书、古今著作和各类报刊作为收字对象，共收楷书单字五万六千多个。它对我国数千种古今典籍中的全部楷书单字进行了一次清理，是古今楷书单字的集大成者。它清理汉字的规模之大，收列楷书单字的数量之多，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部字典。《康熙字典》以收字多著称于世。我们把《汉语大字典》的几个部首与《康熙字典》稍作比较，就能知道《汉语大字典》收字的概貌。

	康熙字典	汉语大字典
人部	926	1163
亻部	14	24
干部	21	28
工	29	36
升	71	91
九	87	121
弋	36	40
巾	376	440
总计	1560	1943

从上表可以看到，《汉语大字典》八个部首的收字数量比《康熙字典》就多出了三百八十三字。这些字一部分是我国已法定使用的简化字，一部分是《康熙字典》的漏收字。在收字过程中，由于严格按照收字细则审核，剔除了各种不规范的字，因此做到了收字多而不滥。《汉语大字典》这种审慎地大规模地清理楷书汉字，对汉字的规范化将起重要的作用。

《汉语大字典》不仅尽可能地收录了古今著作中的楷书单字，做到了多而不滥，而且对所收录的全部字头进行了整理，按照汉字发展演变的内部规律，历史地正确地反映了汉字形、音、义各方面的发展过程。

字形方面。《汉语大字典》把汉字的形体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给予论述，这是一个独创。过去，《正字通》、《康熙字典》在楷书单字下提出过古文形体，但是，都是随意性的，也没有作任何分析解说，而且象《康熙字典》所列的所谓“古文”都是经过楷化了的。我国台湾省出版的《中文大辞典》比《康熙字典》有所进步，但在字形问题上仍然没有突破旧有的局限。由于没有把字形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，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足：一是字形收列没有代表性，有的当收甲、金字形而未收；二是有的当作字形解说而没有解说，有的虽作解说，但只囿于小篆而没有上溯甲、金；三是在编排上字形收列与字形解说分居两处，相互割裂。《中文大辞典》在字形上的随意性非常明显。

《汉语大字典》字形部分是一个独立的整体。在这个整体中有三个紧密相连的内容：一是字形收列；二是字形结构分析；三是字的本义解说。

字形收列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，排除了随意性。收列的甲、金、篆、隶字形都经过了严格挑选，吸取了字形研究的新成果，具有汉字每个发展阶段上的代表性。例如：“令”字，

《说文解字》以前的甲、金字只选收了五个有代表性的形体，小篆以后也只选收了八个有代表性的形体，按甲、金、篆、隶的次序排列，脉络清晰，反映了字形发展演变的过程。分析字形结构是把甲、金、篆、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。《说文解字》是上溯甲、金，下流隶、楷的桥梁。甲、金与小篆相印证，《汉语大字典》取其正确的结论。例如：“休”字的字形，《说文》的解释是“休，息止也。从人依木。”甲、金字形体也是象人在树旁休息。甲、金与小篆一致，结论明确。甲、金与小篆也有不一致的，那就择善而从，不囿于成见。例如：《汉语大字典》对“三”字字形的分析是：“《说文》：‘三，天地人之道也，从三数。’按：甲骨文、金文均以三横代表基数三，为记数符号。许说误。”再就是在字形收列和字形结构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字的本义。如果科学研究尚无正确结论，语言文字学界意见分歧较大，宁肯付阙，决不妄断。例如：“仁”字的本义问题，至今尚未解决，字形解说就指出：“仁的造字本义待考。”《汉语大字典》这种慎重的态度，值得提倡。

字音方面。《汉语大字典》采用三段标音法，在每个楷书单字下分别标注现代音、中古音和上古音的韵部，理清了每个汉字字音发展的脉络，这在我国字典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。现代音标注汉语拼音，中古音标注反切或直音，上古音限于科学研究的水平只标注韵部。对于出自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、《类篇》的中古音主音反切，还标注了声、韵、调。这种三段标音法，不仅方便读者，而且对我国语言研究有极大的价值。从各个阶段的标音上，我们可以看到汉字字音的历史发展，认识它的内部规律性。

现代音的标注，按照“今音从今”的原则，凡是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审定的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、《新华字典》已标注的，统一标注。这有利于汉语规范化，推广普通话。例如：“巫”字旧读 wū，按照“今音从今”的原则，现代音标注 wū；“估”字标注 gū，而不用 gǔ；“佐”字标注 zuǒ，而不用 zuō。为了说明字音演变情况，把后者括起来，以示区别。《汉语大字典》收字五万六千多，很多字没有标过现代音。注音工作之艰巨，任务之繁重，可以想见。但是，根据切实可靠的语音资料 and 普通话语音演变的规律以及和字形、字义的关系，不仅整理出了今音，而且准确地标注了符合普通话声韵配合规律的汉语拼音。这的确是一大贡献。

在中古音的标注上，实事求是，以语音资料为准。凡是见于《广韵》等切韵系统的，一律按照音切材料标注反切；而出现较晚的字，仅见于《古今韵会举要》、《中原音韵》、《洪武正韵》等元、明、清的韵书，则选取该书音切材料标注反切和直音。标音条理清楚，字音流变明晰，避免了《康熙字典》在标音方面混淆语音系统的毛病。在中古音的具体标注上有几个特点：

1. 在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、《类篇》的主要反切后面标注了该反切的调、韵、声。例如：

“令”字的第一二音项：

(一) lìng 《广韵》力政切 去劲来

又 郎定切

(二) líng 《广韵》郎丁切 平青来

又 吕贞切

采用这种音类标注法，便于确定中古音，克服反切标注法的同音异注和异音同注，而能比较好地按音变规律推出今音。用调、韵、声来标明中古音的音韵地位比《康熙字典》、《中华大字典》只标反切和韵部前进了一大步。

2. 一字多义，今音相同，中古音相异，在相应的义项前分别标注中古音。例如：

住 zhù (一) 《广韵》持遇切 去遇澄

(二) 《广韵》中句切 去遇知

这种历史地反映字音源流的标音，便于读者看到字音的变迁，提供了研究字音的材料，是以往任何字典都没有的。

3. 选好主切，标注又音。一字数音，一义几读，是汉字的特点。字音的发展演变是丰富多彩的。在选好主切的前提下，有目的地选择标注又音反切，能真实地反映字音的历史面貌及其演变的状况。例如：

下 (一) xià 《广韵》胡雅切 上马匣
又 胡驾切

在中古时期，“下”字的主要读音是胡雅切，收在《广韵·马韵》，作为小韵韵目。胡驾切是中古时期的又读音，收在《广韵·禡韵》。把胡驾切这个又读音收入，有两个好处：一是确切地反映了中古时期的字音状况；二是可以看出 xià 音演变的由来，显示了中古音与现代音的传承关系。这样标注中古又音，一举两得，是标注中古音的一种创举。再如：

佐 zuǒ (旧读 zuō) 《广韵》则简切 去简精
又《集韵》子我切

从上面的标注，我们清楚地看到“佐”字读音演变的具体情况。

至于上古音的标注，由于语言研究水平所限，各家意见分歧，只标注了韵部。这是在字典上标注上古音的开端。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发展，对上古音的整理和标注一定会逐步完善。

字义方面。汉语历史悠久，字义的发展变化十分复杂。对于字义进行训释的状况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部字典的价值。因此，《汉语大字典》在整理字义上下了功夫，从历史的发展中反映字义演变的规律，从现实的语言中描写字义复杂的状况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：

1. 义项完备。《汉语大字典》吸取了历代字词书整理字义的成果，并根据活的语言材料进行新的概括，建立了众多的义项。它的义项完备程度，超过了任何一部字典。例如：“人”字，《康熙字典》建立了七个义项，如果剔除其中的复音词义项，实际上只有两个义项。而《汉语大字典》古今兼收、源流并重，建立了十七个单字义项。康熙帝在《康熙字典·序》中曾吹嘘说：“一音一义之可采者，靡有遗逸。”实际上，由于《康熙字典》偏重经书，忽视活的语言材料，因此对字义的整理很不彻底，义项的建立当然也不可能完备。

2. 义项排列有序。按照字义产生发展的历史次序排列义项，反映了字义发展演变的规律。通过字的本义、引申义、通假义的清晰线索，构画出了一个完整的字义体系。由于字义发展的复杂性，曲折性，使字义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，《汉语大字典》采用了归纳义群的办法来理顺各义项之间的关系，显示了字义之间的内部联系。例如：“伐”字共建立十四个义项，分为五个义群，按照本义、引申义、通假义排列。“损害”义群统率②“砍伐”③“敲击”④“攻打，征讨”⑤“除去”⑥“毁败，伤害”五个义项；“功绩”义群统率⑦“功劳”⑧“自夸”两个义项；“术语”义群统率⑨“星名”⑩“献上高土”两个义项；通假义群统率⑪“同‘殿’，盾牌”⑫“通‘罚’”⑬“通‘阙’”三个义项；最后是姓氏义。这些义群都是由本义①“砍杀，击杀”引申发展而来的。这样排列义项，字义发展脉络清楚，义项次序井然。

3. 释文准确，例证贴切。以往的字典在训释字义时，往往采用“某，某也”、“某，某某也”的释义方式。这种训释容易产生歧义，引起误解。《汉语大字典》采用了词语式、说明式、定义式、综合式等多种释义方式，以普通话训释字义，准确易懂。为了给义项的确立打下牢固的基础，在释义之后一般都列举了上古、中古、近代和现代三个例证加以佐证。这些例证的选择是严格的，既注意到了例证的时代性，又考虑了例证的典范性，例证与释义吻合无间。例如：

代 ①替代。《说文·人部》：“代，更也”。段玉裁注：“凡以此易彼谓之代”。《字汇·

人部》：“代，更也，替也。”《书·皋陶谟》：“无旷庶官，天工人其代之。”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：“彼可取而代也。”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：“魏武将见匈奴使，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，使崔季珪代。”老舍《茶馆》第二幕：“墙上的‘醉八仙’大画，连财神龕，均已撤去，代以时装美人。”又指代理。如：代局长，代主任。

这是“代”字的第一义项。释义简明扼要，例证明确贴切。这充分表现了《汉语大字典》在整理字义方面的特点。

三

《汉语大字典》不仅从汉字形、音、义各自的发展中反映了汉字的演变规律，而且从汉字形、音、义的相互影响中辩证地反映了三者之间的关系。

在楷书单字条目下，收列有代表性的甲、金、篆、隶等汉字的各种形体，分析其结构，解说其本义，并不混入有关义项的释义之中。但是，汉字的形、音、义又是一个整体，解形的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释义。《汉语大字典》正确地处置了形义之间的关系，把解说造字本义当作释义的基础。本义确立了，引申义和通假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，字义系统也就井然有序了。反过来，由于释义部分的第一义项确立了本义，得到了大量例证的佐证，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字形解说部分的正确性。运用辩证观点恰当地处置了两者的关系。例如：在“人”字楷书条目下收列了甲、金、篆、隶十余个有代表性的形体，解说的结论是：“象人侧立之形”。这就为第一个义项的确立打下了基础。而在第一个义项中列举了《书·泰誓上》、《论衡·无形》为例证，这就无疑地说明了字形解说的正确性，两者相得益彰。

音形、音义关系更为密切。《汉语大字典》遵照“不能片面地只根据字音材料注音，必须紧密地联系字形、字义的有关材料，全面考虑，决定音项的取舍增删”的原则，给予了正确的处理。例如“乞”字标注了 qǐ、qì 两音；“亢”字标注了 gāng、kàng、gēng 三音；“共”字标注了 gòng、gōng、gǒng、hóng 四音；“假”字标注了 jiǎ、jià、xià、xiá、gé 五音；有的音项多达七个以上，如“佻”字。这些音项的建立，是释义的需要，“音随义转”，不得不立。《汉语大字典》古今兼收、源流并重，义项完备，注音配合释义，就必然出现多音项。

同时，注音也紧密地配合了字形。在形声字的注音上，有又读音的，就选取与该字的声符相一致的注音。这样，既配合了字形，又方便了读者，对汉语规范化有极大的好处。例如：“佞”字字形解说引《说文》：“佞，很也。从人，弦省声。”《广韵》有两个反切，胡涓切和胡田切。选用胡涓切为主切，现代音标注 xuán，这就与“弦省声”相一致，配合了字形。另外，由于汉字发展的复杂性，造字本义长期不明，历史上没有读音记载。《汉语大字典》经过考证，引用确实证据，探明了本义，为了配合字形，建立了新的音项和义项。例如：“目”字，字形解说依据徐中舒教授的《耒耜考》，认为“当为耜之象形字”。为配合字形、字义，使形、音、义三者成为一个整体，建立了音项 sì 和义项“同‘耜’”。再如：“丨”字，依据字形解说“甲骨文数字的十作丨”，建立了新的音项义项。

《汉语大字典》认识到汉字形、音、义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用辩证观点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，得到了良好的效果，超越了它的前辈。

总之，《汉语大字典》继承了我国历史上整理汉字的优良传统，吸取了前人的经验，全面地系统地对汉字进行了整理，历史地正确地反映了汉字形、音、义的发展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，为汉语规范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